对话

救赎与重生：灾难教给我们的智慧

再望汶川③

●主持人：张乐天（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嘉　宾：潘天舒（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王一刚（E-house China集团西部总经理、汶川地震志愿者）

肖泽萍（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任）

申荷永（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汶川地震志愿者）

滕五晓（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有人说，关于灾难的道忆与反思总是苦涩的。但时隔一年之后回望汶川，一种共识正在凝聚：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只有珍视灾难带给我们的种种经验、教训，才是我们对遇难同胞最大的告慰。值此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一群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专业人士聚首于复旦大学“上海论坛2009”，共议这场灾难带给人类社会的警示与思考。

主持人：潘教授，作为一位人类学学者，您认为汶川地震带给我们哪些新的思考呢？

潘天舒：近年来，包括汶川地震、印尼海啸等特大灾发性灾难频至。这些灾难实实在在地提醒着我们，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所面临的危险和危机可能比我们预料的多得多，而作为人类本身，其实我们的理性和智慧永远是有限的——即便我们的预测手段越来越先进，也不可能真正准确无误地把握一切。这也算是汶川地震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提醒吧。

当然，灾难虽不可避免，却是对人类提高自身危机预防意识和应对能力最有力的触动。我们在认识到自身能力、知识的局限之后，更须抓紧展开针对性研究，积极探索应对危机的策略。

主持人：就到要总结应对危机的经验和策略，亲历者是最有发言权的。王一刚曾赶往都江堰市政府城市发展顾问、汶川地震后，是我们今天在座中第一个跑去灾区的，可那与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一年来的经历和思考吧？

王一刚：我就来讲讲我的亲身经历吧。这一年我与一个家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也许，用常态化的眼光来看，这个家庭挺特殊。因为，它是由幼后出会生的一位爷爷和几个孩子组成。但正是他们，让我看到一个当地的普通家庭是如何从灾难中坚强地一路走来，并以自己的努力，诠释着“预防”、“守望相助”和“救赎”这三个词汇更深刻的蕴涵——

这个案例中的“预防”来自文化，具体来说，这种“文化”源于学校教育。震后，其中最大的一个孩子曾从废墟中冒出来不少遇难者，他事后告诉记者，当时一直支撑着他和老师、同学们实施自救的是学校的校训——“你可以不成材，但是不能不成人。”学校一直以来对“人”的强调，给了这个孩子一种信念的力量，也使他所在的学校尽管地处震中，却是当地受灾程度最低的学校之一。

“守望相助”的力量则来自道德、家庭。这个家庭中的爷爷今年已经78岁了，但这一年来，他从来没有忽略过对孩子们的“生命教育”。他平时就一直告诉孩子们，死亡也许随时可能发生，但关键在于你面对死亡的时候该怎么办。在他的引导下，家里最大的四个孩子一直为身边的其他孩子做心理疏导。在他们身上，我更多看到了当地民众个体之间的互助之爱，这其中传递着外部介入者无法给予的力量。

此外，这个家庭还用行动告诉我，人类对于“救赎”的理解至少应有两层含义——责任和信仰。震后，孩子们不止一次告诉我，他们知道，无论自己今后走到哪儿，他都是这个地方的人，这里有他的根，而传承这片当地的文化是自己的责任。

也许，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样本，但我想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无启发。

主持人：肖泽萍和申荷永都是心理援助方面的专家。两位在实践中，对于进一步改进心理救援工作有何心得？

肖泽萍：这次震灾发生后，社会各界对于灾后心理救援需求的重视可谓史无前例。但客观地说，我觉得，从实践中可以看到，未来我们在心理救援方面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比如，这次汶川地震就反映出来，相较于我国强大的生医医疗救治系统，我们的社会心理救助系统还处于起步阶段。而如果没有系统化的统一指挥和比较集中权威的信息发布平台，救助工作就容易走向低效。又如，要培养一个合格的职业心理治疗师，其专业化程度绝不亚于对于一名医师的培训。而我国现有的人力资源储备明显不足。所以，下一步，除了要提好灾后心理援助系统，能否建立起一个点面结合、立足长远的社会化心理援助网络同样时不我待。

申荷永：我也一直在思考：我们常说“危机”是危难与机会的结合，那么，具体到心理救援而言，到底什么才是连接和转化“危”、“机”之间的关键呢？

实践告诉我，连接要靠“文化”，转化则要靠“创造”。无论是与受助者建立关系，还是帮助他们重建心灵家园，都必须立足于当地的文化土壤。而通过引导灾民从事一些创造性的活动，往往能帮助他们的创伤获得转化，缓解因为灾难而遭留下来的种种心理问题。

主持人：滕教授毕业于当今灾害学领域最好的学府——东京大学，也是我们今天现场唯一一位专门从事灾害学研究的学者。对于我国进一步完善灾难应急体系，您有何具体建议？

滕五晓：客观地讲，灾害总会发生，且无孔不入，但经验告诉我们，面对灾难的不期而至，关键在于我们做好准备了没有。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首先，我们政府的管理方面如何准备——公共管理和服务人员是否具备了最基本的危机管理知识；政府机构是否拥有一定数量的灾害管理和安全管理人才；灾害情报的收集、分析和传递机制是否能高效运作。

其次，我们的社会如何准备——危机管理除了政府以外，需要全社会的参与。需要一个在需要时可完全调配、统一指挥的社会体系，从事各类预防、教育、培训、演练、应对工作。

再则，我们的科学研究如何准备——能否针对一些特大型危机，制定出细致、可行的应对预案；对于无法避免的灾难，能否在建筑标准、风险识别和评估方面通过一系列的操作程序引领称、等等。

只有做好充分的、全方位的准备，我们才能够在下一次风险到来时把损失降到最低。这需要公共财政的投入，也需要学界跨学科的共同努力。

（本报记者 柳 森 整理）

专栏

“代沟”与知识转型

文/王鑫磊

“代沟”这个词，在当代话语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人们一般用它来指两代人之间难以相互理解和沟通的现象。最典型代沟产生在父辈与子女之间，但并不限于此。对当下的网络论坛稍加关注就会发现，发生在所谓“80后”与“90后”之间的言语交锋并常热闹，而他们也都知向于用“存在代沟”来形容彼此之间的关系。对于代沟，几乎所有人都会有一个共象的认识，但是对于代沟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应该怎样去应对等问题，一般人较少去思考。

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学者对代沟问题做出过精辟的理论分析。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其代表作《代沟》一书中提出“后皆文化”的概念，所谓“后皆”，是指社会上年轻的一代人掌握了与老一代不同的新知识，老一代人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不得不转而向年轻一代学习，年轻一代因为掌握新知识的力量而受得越来越不安分，他们开始质疑和挑战老一代的权威，而老一代则努力维护着自己固有的权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两代人之间的思想观念差异逐渐显现、放大，并在特定情况下表现为冲突的形式。这就是我们通常理解中的代沟形成的深层原因。这一经典论述至今仍被奉为主象，而从中我们得到最关键的一点启示是，代沟产生的根源是知识的因素，即社会上主流的知识内容和知识流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套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知识转型。

现在我们讨论代沟问题，往往都是就事论事，对现实情况展开分析，然后提出对策，这当然是一种可行的方式，但还不是唯一的方式。我们知道，代沟绝不是当今社会才有的现象，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曾经不断重复出现的问题。只要一个社会中出现知识转型的情况，就会伴随代沟的产生。比如之前提到的米德的研究，就是针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社会的代沟现象展开的。表想大家都明白以史为鉴的道理，既然如此，应对当今中国社会的代沟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国本身的历史中去寻求一些经验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从代沟与知识转型有着内在联系这样一个角度出发，结合中国历史进行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做出这样的描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的内容和流动性因为科举制度的存在被相对固化，在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知识转型，因此代沟几乎没有发生。及至晚清，随着西方知识大量进入，中国初现知识转型的端倪，但总的表现传统与现代是各交织在一起，代沟真有表现但并不突出。类似中国历史上知识转型和代沟最为明显的时期，大概结束于四时期裂点，以西方科学为主的新知识体系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冲突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与此相伴的诸如新文化与旧文化、新思想与旧思想、传统与反传统、保守与激进等一系列问题，都折射出这个时代日益加剧的思想变革和知识转型。

谈到“五四”时期的代沟，大概可以列举一些情况来加以说明：首先是当时的媒体舆论中，对于“新”与“旧”、“青年”与“老年”这样两对概念曾一度展开并尝激烈的争论，这实际上就是前后两代人观念冲突的缩影。其次，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新旧两代的分化相当明显。最后，观念上的交锋对社会层面也产生影响，一个直接的结果是青年人作为一个群体的地位不断上升，在社会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最终几乎成为一支决定性的力量。

然而，我们也看到，“五四”时期的代沟并非完全表现为两代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同时也有着相互理解和包容的和谐的一面。比如本大到在新与旧、青年与老年的观念转向抵化之际，多次抑演调解者的角色，提出两者应该“互相接过，互相涤洗”，彼此都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从而有效缓和了冲突。在这个时期，代沟在两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最后也伴随着学术权威之争的流云散尽，以两代读书人共同开创清华国学研究的事业收尾。两代人的知识之争，最终还是以一种共同推进知识发展的形式，回到了正常的轨道。

从历史回到现实，我们究竟能够汲取哪些经验和启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从代沟隐的出现到代际冲突爆发，一般都会有一个酝酿的过程，而在其积累阶段，只要处理得当，尽可能引导其趋向缓和，努力去搭补这条沟壑，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代沟扩大化。这里最好的策略无疑是调和而不是打压，李大钊在“五四”时期的论战中提倡而由，以折中的态度进行调解的做法，应该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在倡导和谐社会的今天，代际和谐作为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指标之一，越来越引起各方关注，而从历史经验和知识转型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要实现代际和谐，关键是要形成对知识的包容心态。

所谓对知识的包容，一是对知识的接受，二是对知识的尊重。举例来说，“五四”新老两代知识分子在面对知识转型时，新的一代在新知识的接受上没有太大的困难，相比之下对旧知识的尊重是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对于旧的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关键则是要包容和接受新的知识。而当时的两代知识分子在因知识转型而产生代沟的情况下，双方最后都基本能够尊崇知识成长的规律，并彼此都表现出同情的理解，这一点是最值得称道的。

毋庸置疑，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知识转型的局面，同样把对知识的接受和尊重这两个问题摆在几代人的面前。事实上，任何知识的存在都有其价值的，没有国界之分，也没有有用无用之别。接受新知识、尊重旧知识是每一代人都应同样采取的正确态度。有了知识的包容作为前提，人与人之间的包容、代际的包容才能成为可能，代际的和谐才能有坚实的保障。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高 渊 执行编辑 支玲琳
E-mail:jfdailyview@jfdaily.com 第884期